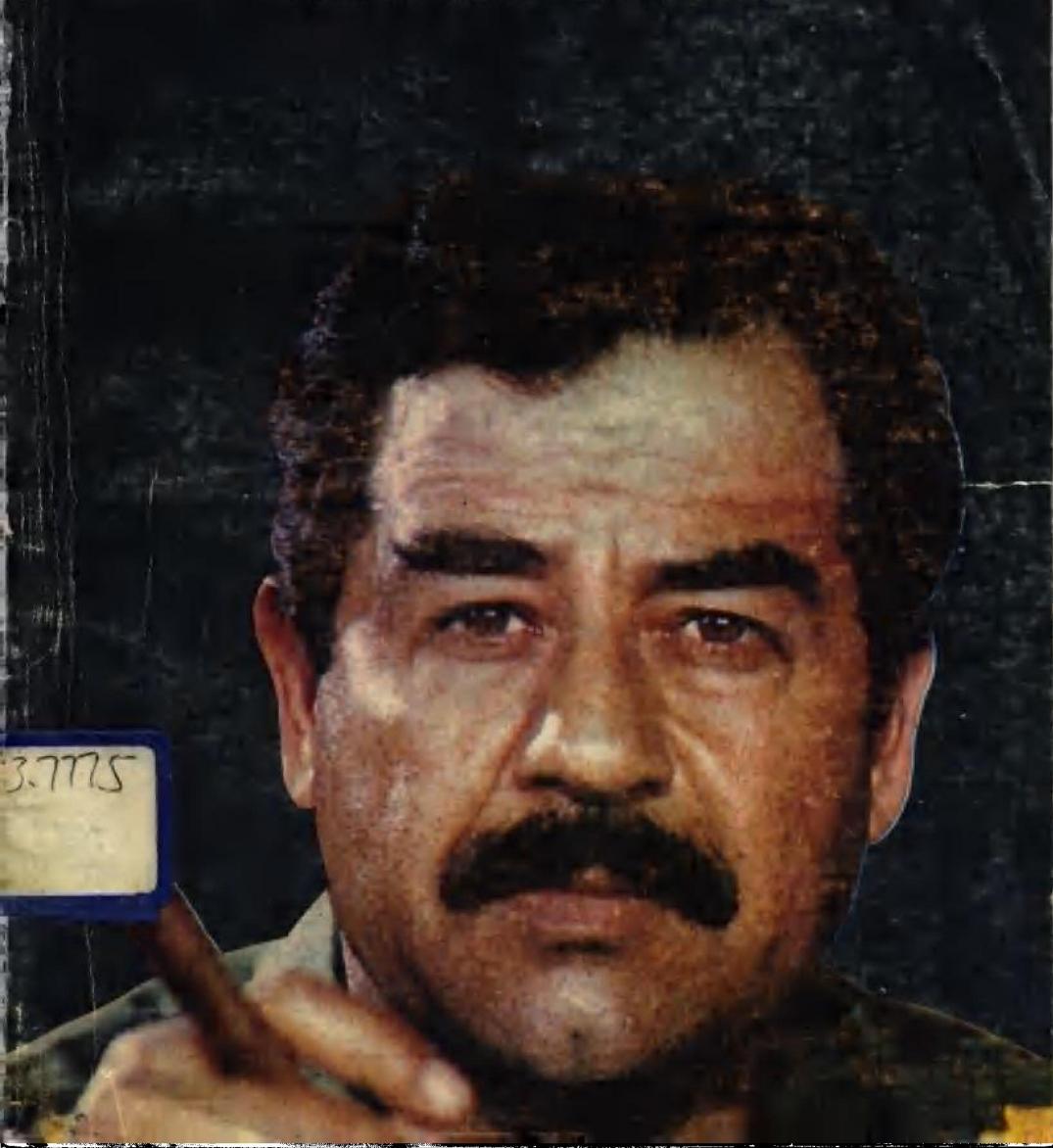


# 萨达姆·侯赛因

〔黎巴嫩〕福阿德·马塔尔 著



Fuad Matar

SADDAM HUSSEIN

The man, the cause and the future

Third world centre

根据黎巴嫩第三世界中心1981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米小平

封面设计：施本铭

萨达姆·侯赛因

〔黎巴嫩〕福阿德·马塔尔著

殷 显 胡国成 吴必康 周晓慧 译

闻 歌 刘靖华 俞金尧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7.75 字数：194000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

---

ISBN7-5012-0362-8/K·69 定价：3.50元

---

## 出版说明

海湾危机爆发以来，萨达姆·侯赛因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人们渴望更多地了解这位蒙上了某种神秘色彩的人物。本书介绍了萨达姆，对他的主要政治经历、内外政策，以及从家庭伦理到国际政治问题的基本观点，都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书中还介绍了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伊拉克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了解萨达姆其人以及当前的海湾危机背景。这就是我们翻译出版此书的唯一目的。

中东地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对于那里的人和事，不同立场的人们各有不同的评价。即使阿拉伯世界的舆论也有不同的倾向和色彩。本书表达的只是作者的见解，并非所有观点都是阿拉伯世界公认的定论，作者的立场当然也不等同于我们的立场，这都是毋庸赘言的。

## 目 录

序 .....	1
引言.....	14
第一章 家庭和统治者的叛逆.....	21
第二章 一个指挥部 两位领导人.....	31
第三章 国际良师益友.....	72
第四章 艰难的共处.....一场必将爆发的战争.....	90
第五章 科技时代阿拔斯王朝似的统治风格.....	112
第六章 忠诚誓约.....	155
第七章 阿布·阿迪.....	172
第八章 采访萨达姆·侯赛因.....	181

# 序

1980年9月17日将成为现代伊拉克历史上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伊拉克人民发现自己已卷入了战争。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莅临国民议会（25年来伊拉克首次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以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宣布对苏伊士运河实现国有化时相似的口吻，宣布废除1975年3月6日同伊朗签订的协议，并要求“归还伊拉克暨阿拉伯所属阿拉伯河的所有权力及主权”。萨达姆·侯赛因当天身着武装部队总司令官服，其他伊拉克高级官员则穿标准军装。同伊朗“被推迟了的战争”开始了。战争之所以称为“被推迟了的”，是由于它酝酿了很长时间。实际上，为了解这场战争，人们必须回到1975年3月6日协议签订那天，对日后发生的事做一番简要回顾。

1975年3月，已故阿尔及利亚总统胡阿里·布迈丁成功地促使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同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举行了会晤。这次会晤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第一次首脑会议期间在幕后进行的。那时，伊朗国王的势力正处于鼎盛时期，而萨达姆·侯赛因却陷于一场消耗战——伊拉克军队正在北部同库尔德反叛者交锋，一年之内便有60000名伊拉克人在战斗中阵亡或负伤，其中有16000名政府军士兵。库尔德反叛者是由伊朗国王资助和武装的，但布迈丁还是找到了使两个人坐下来谈判的基础——势力强大的国王已开始感受到革命的冷风，在伊拉克的支持下，伊朗的革命活动已经开展，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正在他流亡的伊拉克城市纳贾夫领导一部分伊朗革命。纳贾夫是伊玛目·阿里的安息地，受什叶派穆斯林的尊崇。



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之子伊德里斯·巴尔扎尼和马萨乌德·巴尔扎尼。伊拉克人愈加确信伊玛目·霍梅尼的首要目标是颠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便以支持反对革命的伊朗人作为回报。伊朗领导人毫不掩饰这一目的。在伊拉克的“号召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和伊玛目·霍梅尼的坚定支持者阿亚图拉一穆罕默德·贝克尔·萨德尔的死刑执行之后，伊朗人公开号召伊拉克军队起义，反抗萨达姆总统的政府，因为这个政权“不是穆斯林的”。不言而喻，伊拉克也着手反对被它看成是“种族主义和波斯人的”伊朗政权。

1980年9月初，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已了解到伊朗在两国交界区调动军队，住在那里的伊拉克人每天都处在炮火威胁之下。他召集军队领导人分析局势，并让伊拉克外交部通过外交渠道同伊朗人进行交涉，要求他们撤出伊拉克领土，其中最主要的是贾赞乌斯一带被占地区。伊拉克的备忘录在9月7日递交给伊朗军队，伊朗军队非但不撤，反而得到了喷气式战斗机的增援。于是，萨达姆总统决定解放贾赞乌斯及其他地区。甚至在会见非军方人士时，他也不隐瞒这一决定。例如，他在9月8日会见高级文化委员会成员时宣称：“每一个伊拉克公民都应准备为他的国家和他的原则流血”。此刻，边境上的伊拉克军队正在实施被称为“萨达姆·侯赛因行动”的解放计划。计划实施的非常迅速——炮击了两个伊朗城市，击落飞机两架，俘虏了许多士兵。9月9日，伊拉克军队在几个小时之内便得手了，国旗飘扬在贾赞乌斯地区上空，俘虏大批伊朗士兵，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文件。从那时起，战报一个接着一个，更多的飞机被击落，敌人遭到了更严重的损失。战场已经扩大，伊拉克空军也卷入了冲突。

9月17日，萨达姆总统召开革命指挥委员会会议，决定废除伊拉克同伊朗签定的阿尔及尔协议，因为伊朗人显然不打算遵守这项协议。伊朗总统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对此已有暗示：“谁签订了阿尔及尔协议？就是国王政权也没有履行”。萨达姆

总统又召集国民议会特别会议，在审议了阿尔及尔协议的细节之后，要求将阿拉伯河主权归还伊拉克。他的话是对全世界说的：“我们向全世界申明：伊拉克在1975年3月以前对阿拉伯河享有全部主权时期，相当有效地管理了这条河的航运，这表明伊拉克既有能力也有责任。今天的伊拉克更具备履行责任的能力。”随后，伊拉克政府又通知所有来往阿拉伯河的船只，今后凡经该区域必须悬挂伊拉克国旗并听从伊拉克官员的指令。通知指出，废除阿尔及尔协议已使伊拉克享有在其土地、领空和水域的一切主权。此外，这些船只应向伊拉克交纳通航费并使用伊拉克的航行设施，雇用伊拉克引水员通过航道。通知还说，凡在该区域发生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均应接受伊拉克法律裁决，伊拉克承担所有管理和服务费用，因为阿拉伯河水道是伊拉克领土的一部分。

萨达姆总统从一开始起就小心地指出，他仅仅希望收复被伊朗占据的伊拉克领土，并无侵占伊朗领土的野心。这是在向超级大国发出信息，让它们不要介入冲突。但收复主权和领土就意味着战争。于是，革命指挥委员会在9月22日向伊拉克武装部队发出命令：向伊朗军事目标发起攻击。冲突急剧升级扩大，显然已不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

伊拉克军队侵入伊朗领土，攻占了一些阵地，包围了穆哈迈拉（居民以阿拉伯人为主，伊朗名称是霍拉姆沙赫尔）等几座城市。伊拉克的战略是：围困大部分伊朗进口物资都在其港口卸货的穆哈迈拉；袭击炼油厂和经济设施；围困其他城市；袭击伊朗边境地区、内地和远至德黑兰的机场和军事基地。伊拉克希望以此迫使德黑兰革命当局承认战败，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谈判两国间的和平共处问题。但德黑兰革命当局没有承认失败，反而散布伊朗军队正准备发动反攻的消息。不过，伊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随着数十架飞机被击落、数十艘船只被摧毁、数百名官兵被俘而彻底破灭了。在战争的第18天，伊玛目·霍梅尼号召伊朗人同伊拉克人作战，因为他们是“异教崇拜者”，而萨达姆·侯赛因则

是“异教徒”。与此同时，巴尼萨德尔总统忙于释放那些因涉嫌为“萨瓦克”（国王的秘密警察机构）工作或阴谋反对伊朗革命而被关在监狱里的军官，以便把他们派往前线。伊朗代表团到世界各地搜购武器、弹药和备用零部件，这种努力注定要失败——为伊朗军队拥有的现代化美国装备寻找零件是不容易的。

某些阿拉伯人试图在交战双方之间进行秘密或公开的调解，但萨达姆总统告诫阿拉伯各国：它们应同阿拉伯的伊拉克站在一起，不要充当调解人。调解活动遂告失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是最出众的调停者，他在两伊战争中采取了中立立场。此刻，人们又把目光转向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他是布迈丁的继承人，而阿尔及利亚又是三月协议的一方，人们期望他扮演调解人的角色。本·杰迪德确实尽了努力，但为时不长。代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调停者也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哈比卜·沙堤走访了这两个国家，但在伊朗却和亚西尔·阿拉法特遇到的情况一样，没能见到决策者。伊朗的决策者是阿亚图拉·霍梅尼，尽管调解人同执行机构首脑巴尼萨德尔见了面，但这位伊朗的行政长官无权做出决策。后来，阿亚图拉·霍梅尼会见了哈比卜·沙堤，然而伊斯兰调解活动仍毫无成效。

令人感兴趣的是，伊拉克人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仍响应伊斯兰调解活动，下达了停火命令。伊朗人拒绝了停火呼吁，坚持在军事形势恢复到9月8日之夜的状况以后才能实现停火。一些伊朗官员走得更远，伊朗驻莫斯科大使甚至说：如果伊拉克军队后撤、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下台、伊拉克割让巴士拉以补偿伊朗在战争期间的损失，伊朗就接受停火。这位大使被召回，但后来又返回岗位。停火只维持了几个小时，伊朗人根本不遵守，他们不分民用和军事目标，炮击了几座伊拉克城市，以此作为对伊拉克入侵的报复。所以，伊拉克在1980年10月6日发起回击，空袭了德黑兰及其郊区，伊朗在阿拉伯河沿岸的

海军基地也被摧毁，伊朗海军遭受重创。

本书论述两伊关系的章节（见第四章）和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采访中对两伊关系的分析（见第8章）表明，这场战争是注定要发生的。战争之所以无法避免，是由于阿亚图拉·霍梅尼不会忘记伊拉克在伊朗革命仅仅几个月之前将他驱逐出境，同时，伊玛目·霍梅尼推翻了国王政权之后渴望输出伊斯兰革命。而只要伊拉克在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之下，保持强大和稳定，这种局面就不会出现。伊玛目·霍梅尼多次说过，“伊拉克是波斯人的”，“萨达姆·侯赛因和复兴党人是异教徒”。战争爆发前4个月，伊朗电台广播了伊玛目的几次声明，号召“伊拉克人民把自己从侵略者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奋起反抗伊拉克的这个非伊斯兰党是伊拉克人民和军队的责任”。此外，伊朗军队还时刻处于动员状态。军方得知，入侵伊拉克是对他们的期望，他们在那里将会受到伊拉克人民的欢迎。再有，伊朗人一直试图煽动伊拉克的教派骚乱。战争的不可避免还由于伊朗在国势强盛时夺取了伊拉克的某些权利和领土。只有伊拉克足够强大时，才能指望它有收复这些土地和权利的念头。

以下分析有助于澄清战争爆发的背景：首先，走向战争的决定可以说从1975年3月6日签订阿尔及尔协议那天起就做出了。伊拉克签订了一项它认为是侵犯了自身权利的协议一事，可以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在1970年7月接受罗杰斯的中东建议相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作法是一种策略，使他可以将火箭发射架运进苏伊士运河区。同样，当时担任副总统的萨达姆·侯赛因不得不接受协议，为的是赢得喘息时间，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和一支强大的军队。有朝一日，这支军队可以在通过外交手段无法收复阿拉伯河水域和主权的情况下同伊朗国王的军队较量一番。

另一方面，这场战争不是出人意料的，除了从协议的签订到伊朗国王被推翻这段时间外，它一直以一系列边界冲突的形式不

明显地进行着。然而，战争毕竟是第一次在两个国家之间直接发生，伊朗人过去是通过库尔德进行反伊拉克战争的。

从战争一开始便可看出，伊拉克想在伊朗领土上进行战斗，由于伊朗国土辽阔，它并未指望速战速决。这场战争不是以伊拉克军队的演习为先导的，而首先是通过对人民的真正动员。萨达姆总统自担负全部责任之日起，便逐个访问了伊拉克几乎每一个地区，他每一次对群众发表讲话时都着重申明伊拉克的目标。在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交往时，他还采取了灵活政策，一旦战争爆发，便能于己有利。总统担负全责之后还多次暗示，伊拉克正在为某件事做准备。萨达姆总统反复重申的一种说法进一步挑明了上述暗示。1980年4月15日在摩苏尔发表的讲话中提到了这种说法，这次讲话是在同伊玛目·霍梅尼的冲突中采取的重要步骤。萨达姆总统说：“读一读伊拉克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它不是指路明灯，就是受侵略军铁蹄的践踏。”

应当指出，伊拉克复兴党在事前几个月就已开始为战争的突然爆发做准备了。党的领导人多次提到：伊朗不打算归还被占领土。秘密报告和备忘录表明，如果伊拉克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便会同伊拉克开战。这些报告是根据在号召党成员那里发现的文件做出的，他们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说法：“伊拉克是阿拉伯半岛的关键所在，征服了伊拉克就能征服整个半岛。”伊拉克军队也为战争的突然爆发做了准备，军方报纸和周刊在开战前几个月发表了分析两伊关系的文章；参谋学院新开了课程，告诉军官们一旦同伊朗发生战争或伊朗向伊拉克宣战，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很明显，当战争爆发时，尽管什叶派穆斯林在伊拉克军队里占据多数，但激励他们的是民族主义，而伊朗军队的动员则靠宗教意识。伊朗新闻界集中向人民和军队宣传伊拉克人是异教徒，这对伊拉克军队产生了反作用，它是靠对真主和国家的信念去打仗的。

很快便可看出，伊拉克发动的这场战争需要一位善于策划、行动果断和敢于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并充满自信心的领导人。

两国的边界有1000多公里，拥有4000万人的伊朗在人口密度上占据优势，超过只有1300万人的伊拉克。此外，国王留下的军队尽管遭到伊朗革命的清洗而被削弱，显然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的装备先进，由于在人质问题上同美国发生冲突而缺乏备件和保养，但没有影响其战斗力，伊朗空军对伊拉克的有效打击证明了这一点。战争的最初两周内，伊拉克领教了伊朗人给它造成的严重损失。现代史上的伊拉克从未经历过一场全面战争，在北部同库尔德反叛者进行的战斗远离城市中心，没有对城市造成直接影响。

萨达姆总统在做出开战决定时，考虑到了所有上述因素。他惯于做出重大决策：发动1968年7月17日革命；1968年7月30日驱逐阿卜杜勒·拉扎克·依纳夫；实现伊拉克石油工业国有化；参加1973年10月中东战争；解决库尔德问题和在巴格达阿拉伯首脑会议上抵制戴维营协议。这一次，总统权衡了战胜和战败的可能性，以及有可能败到何种程度，当发现战胜的可能大于战败的可能时，他为战争开了绿灯。

战争爆发时，伊拉克的潜在得失可以概括为：势必收复被伊朗占领的土地；定能挫败伊朗颠覆伊拉克政权和输出伊朗革命的野心；促使超级大国在制定对阿拉伯世界、尤其是海湾地区的战略时对伊拉克兴趣大增并格外加以注意，因为它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可以一劳永逸地考验出谁是自己的朋友，谁是自己的敌人；迫使某些阿拉伯国家做出它们无法回避的选择；可以检验本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判断其掌握现代化武器的水平，因为伊拉克军队毕竟在准备履行它的民族义务——同以色列作战。在这方面令人感兴趣的是，伊朗军队的武器与以色列的属同一类型。同时，在正规军投入战场的情况下，可以使它的人民军获得控制局面的实际经验，并从培养人民过战时生活中得到好处，复兴党也可获得应付战争局面的经验，而不仅仅限于理论上的探讨。

伊拉克将要失去的是8年发展的成果。但另一方面，如果伊拉克不证明自己是个军事强国，这些成果总要不断受到威胁。在

过去的8年里，伊拉克着手建设了许多大规模发展工程，一旦伊拉克军队进入伊朗领土，这些工程便会受到影响。不过，只要伊拉克的发展计划是经过认真研究的，而计划人员又能避免那些装门面的工程，注意战争期间的防护问题，是有可能重新建设起来的。同伊朗的战争不会是最后的战争，何况伊拉克无论如何都打算收复巴勒斯坦。在这方面，证实苏联所持的立场（两国间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并弄清楚伊拉克独自采取的行动在何种程度上会被苏联当做障碍，对伊拉克是有好处的。

这场战争使人们认识到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另一个侧面，表明他具有领导一场战争的不同寻常的能力。早些时候，他的其他才能已引起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创始人阿弗拉克的注意，他发表的一篇讲话可以说是将党的领导权交给了萨达姆·侯赛因。在指挥战争的时候，萨达姆·侯赛因的神经是铁打的，他志在取胜，同时又准备面临挫折。萨达姆总统不是那种从早到晚呆在作战室里，只是到议会去宣布停火才露面的领导人，不像萨达特总统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所做的那样——当埃及军队在解放被占领土的势头上升时下令停止前进。1980年9月22日，萨达姆总统甚至坐在第一辆越过边界的坦克里，同士兵们一道进入伊朗领土。正如他在1968年革命中所做的那样——冲在第一批向总统府发起攻击的队伍里。如果不是下属军官们坚持他应留在后方指挥战斗，他是会一直在前线作战，直至战争结束的。萨达姆总统经常注意同人民保持接触，当他在大街上同伊拉克人聊天或不经通报随时到各地农村走访时，总是以自己的热情激励群众。当伊朗的鬼怪式战斗机在头顶上呼啸时，这种街头散步无疑显示了他的自信。

尽管萨达姆总统在战争中拒绝阿拉伯国家的调解，但并没有把其他调解人拒之门外。与此同时，他还十分注意让世人认识到他打算保证让进口伊拉克石油的国家能继续得到石油供应，这使他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赏。战争表明了萨达姆·侯赛因担任总统以来所采取的立场和他显示出来的灵活性，他就是以此为一场他

知道必会来临的战争做准备的（其中包括他在1980年2月8日提出的旨在阐明阿拉伯国家和其邻国之间关系的《民族宪章》）。战争促使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接受伊拉克为一个强国，如果它们能接受一个更强大的伊拉克，战争就会更快地得以调停。

萨达姆总统也不是那种在战前给人民以繁荣，在战时又忽然迫使他们为生活必需品而奔波的领导人。伊拉克在战前既充分储备了大量食品，也储备了弹药，萨达姆总统不会忘记在北部战争中军队缺乏弹药的情景。甚至有消息说，伊拉克在过去5年里大规模收购黄金，以便在战时扶持本国货币。国际间各式各样的军备研究能否提供有关伊拉克的准确数字，是值得怀疑的。伊拉克在过去5年里购买了大量武器，但从不大事声张，也从不展示这些武器。伊拉克军官还对伊朗拥有的武器做了认真研究，故在战争期间，伊拉克士兵能够使用从伊朗人手中缴获来的武器，有时就用伊朗的武器同伊朗人作战。不要忘记，过去的5年里，伊拉克引渡了大量伊朗人。现在看来，这一举动是在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那些年被引渡的伊朗人总数约为10万，如果伊拉克在同伊朗开战时国内住着大量伊朗人，它就不得不对付一支强大的第五纵队了。

同样也很清楚，在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牢固的约旦—科威特关系也是基于战争考虑的。由于叙利亚拒绝站在伊拉克一边，科威特又难以承受压力，约旦有必要从“战略深度”上鼓起勇气站在伊拉克一边，为伊拉克提供港口和机场。伊拉克人绝不会忘记侯赛因国王在战争期间的立场，也绝不会忘记那些在战争期间向伊朗靠拢而疏远伊拉克的某些阿拉伯国家的立场。

巴格达本身对伊朗鬼怪式战斗机的空袭做了充分准备。在此之前，它从未受到过空袭，即便英国人也只是用飞机袭击军营，从不轰炸城市本身。伊拉克首都显然是个易于袭击的目标，雷达网也无法提供有效的保护。巴格达市绵延甚广，宽约50公里，长约70公里，给伊朗飞机提供了袭击便利。尽管如此，仍有几架伊

朗飞机在巴格达上空被击落。

战争刚刚爆发，世人的目光就盯住了萨达姆总统竭力为伊拉克搞来的核反应堆，以色列在战前掀起的针对伊拉克核能力的宣传攻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人说第三国介入了战争，那是因为以色列已尝试用某种方式攻击伊拉克核反应堆，法国驻伊拉克大使在谈到这种攻击时证实了这一点。不过，伊拉克已拟定了应付上述不测事件的计划，反应堆周围的牢固防卫使以色列的企图成为泡影，防卫体系的缺陷在袭击过后很快得到弥补。

这场战争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伊拉克空军没有投入战斗，伊朗在战争的最初几天损失了400架飞机中的200架，而伊拉克空军只损失了少数几架飞机。伊拉克一直将飞机分散在国内外各地，以便保卫那支曾在1973年十月战争中有效地在埃及前线作战的力量。当时，伊拉克的“猎人”式飞机曾切断了以色列对西奈半岛发起进攻的前进道路。

伊拉克明确表示：它不是在同伊朗军队和伊朗人民作战，而是在同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统治和伊朗革命卫队作战。所以，伊拉克给伊朗被俘士兵的待遇是很好的，并向他们解释发动战争的原因（被俘的革命卫队成员得到的待遇则与此不同）。伊拉克是在伊朗正规军和革命卫队之间十分敏感的关系上作文章，利用伊朗正规军对自身处境的不满情绪。显然，伊朗正规军士兵不会以革命卫队所具有的那种热情投入战斗。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完好无损的车辆被缴获，那么多士兵缴械投降。伊拉克的作战计划包括以装甲部队为先导，不动用过多步兵，故而人员损伤维持在最低限度。伊拉克军队是阿拉伯国家唯一彻底的国家军队，所有军官都是伊拉克人，其中大部分为复兴党党员。

显然，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希望在伊玛目·霍梅尼活着的时候进行战争，而伊玛目糟糕的健康状况促成了及早作出开战决定。不容否认，战争给伊玛目·霍梅尼政权带来了机会，使它得以团结人民反对外来威胁，使他们不得不将分歧置于一旁。但

是，一旦战争结束，这些分歧就会比以往更深刻。此外，尽管战争是伊拉克发动的，但伊朗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甚至在更大的国际范围内是孤立的。这是一个良好的开战机会，如果伊朗渡过了革命时期，找到了它自己的波拿巴，或它面临着与阿富汗同样的命运（特别是伊朗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局面就大不相同了。伊拉克愿意同伊朗相处，并同它在各种层次上交往，但不能同像目前的伊朗这样一个咄咄逼人的邻居相处。

两伊战争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之间第一次发生战争，也是超级大国的介入保持在最低限度的第一次战争。它是该地区世俗的阿拉伯国家领导同宗教领导之间发生的第一场战争，也是美国武器吃败仗、苏联和法国武器占上风的第一场战争。伊拉克购买的巴西武器也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无足轻重。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特殊的领导风格有3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他在1968年七月革命时不允许军队独自行动，而是让军队和党联起手来，这一策略他是自始至终贯彻的，可以让双方都保住自己的地位，从两伊战争中可以看出这种策略的成果。

其次，萨达姆总统能够在由两位领袖组成的统一领导下办成相当多的事（他当时是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主席是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他利用这一时期采取了诸如石油国有化、解决库尔德问题和建立一个以强大的军队为后盾的现代化国家等重大步骤，这种能力已结出果实。

再有就是萨达姆·侯赛因在1978年11月于巴格达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在那次会议上，他成功地说服阿拉伯各国勉强在最低限度上取得一致，以对抗戴维营协议。从此之后，他不再仅仅是伊拉克的“强人”，而且还是“阿拉伯强人”。巴格达首脑会议是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同保守的阿拉伯各政权实现和平共处的第一次机会，这种共处是民族责任所要求的。在萨达姆·侯赛因担负起全部责任到两伊战争爆发这一短时期内，他加强了不结盟运动中的阿拉伯力量。确实，自上一次在

巴格达举行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以来，大多数不结盟国家领导人访问了伊拉克，以配合萨达姆总统为1982年在巴格达举行的下一次首脑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萨达姆总统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强了伊拉克同非洲国家的联系。他亲自挑选伊拉克驻非洲各国的大使，而且这些人在任职3年期间都是伊拉克外交部的第一流大使。伊拉克同苏联订有友好合作条约，但萨达姆·侯赛因总统鉴于超级大国对他国事务的干涉，在1980年2月8日倡导的民族宪章中将苏联和美国置于同等地位，这一作法使他赢得了第三世界和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有必要指出：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全无某些领导人所具有的那种复杂心态，即对自己在历史上的确切位置持怀疑态度。比方说，夏尔·戴高乐的继任者乔治·蓬皮杜、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以及尼赫鲁和毛泽东等人的继任者都陷入过这种复杂心态。萨达姆总统能够得以避免，是因为他从1968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掌权之日起就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并且同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肩并肩领导着国家，直至1979年7月17日贝克尔退休，萨达姆·侯赛因担负起全部职责。

萨达姆总统的领导才能在战争期间发挥得更为充分。他在视察阿巴丹郊外前线时对伊拉克飞行员说：“许多敌对势力不希望伊拉克占据恰当的位置。因为他们知道，这种状况将给阿拉伯民族带来好处。”他的这番话把许多问题归结为一点：即强大的伊拉克是一回事，而非常强大的伊拉克却是许多国家无法接受的。根据我在准备本书写作时同萨达姆总统的多次谈话中得出的结论和他自战争准备阶段到战争最困难时期的举动，我敢断言：萨达姆总统正寻求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角色将造就一个非常强大的伊拉克，无论风险有多大。

福阿德·马塔尔  
1980年12月于伦敦